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

总编

赵一新

天竺山志

(上)

〔清〕

管庭芬等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

赵一新 总编

天竺山志

(上)

[清]管庭芬原辑、曹籀删订、释悟化校录
曹中孚标点,王其煌、顾志兴审订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竺山志·上册/(清)管庭芬等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7. 12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赵一新总编)

ISBN 978-7-80758-044-7

I. 天… II. 管… III. 佛教—寺庙—史料—杭州市
IV. B947.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6821 号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俞昶熙	木 鱼				
总 编	赵一新					
副总编	金志强	光 泉				
编 委	吴建华	定 本	妙 高	月 真		
	智 圆	王其煌	顾志兴	徐吉军		
	魏得良	褚树青	曹中孚	朱家骥		

为杭州人文增辉之盛举

——赵一新总编“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二辑之序

杨曾文

前年笔者到杭州佛学院讲课期间，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巧遇了当时任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现任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赵一新先生。我们越谈越投缘，原来15年以前他曾给我写过信，问关于日本禅僧心地觉心入宋在杭州护国仁王禅寺，从无门慧开禅师(1183—1260)学禅期间跟一位名叫张雄的人学吹尺八，回国后将尺八传入日本的事。我说记得此事，还给他回过一封信，近年也得知他经过多次调查终于找到护国仁王禅寺的遗址，并已与日本展开交流，为此感到高兴。

前不久，赵一新先生为总编的“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辑已经出版完毕，他特地将我所缺的几册寄赠给我，并且电告第二辑“杭州佛教文献丛刊”已经开始编校，并将陆续交付出版，希望我能为此辑写序。

我当即答应了下来。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辑共 10 册，收载重新加以整理和校对、标点的有关杭州佛教寺院、人物和名胜古迹的图书 19 种，皆由杭州出版社用简体字陆续出版，不仅受到佛教界人士和从事佛教文化研究的学者的欢迎，也正受到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各学科研究的学者及广大读者的重视与欢迎。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辑 10 册所收载的书目，从第一册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到第十册清吴本泰《西溪梵隐志》，图书中凡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者，皆保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原文和各书原序，其他如原书目录、寺志的志图皆按原样编印，至于正文、附录的各种碑铭资料，皆以十分醒目的方式突出标题、分段排印。各书的卷首皆载有《说明》，对原书作者、重要的序作者及全书内容结构、原书不同版本及丛刊编委会整理本书和点校的做法，皆作简要说明，从而给读者提供很大方便。

据赵一新先生寄来的“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二辑目录可知，此辑的出版是继第一辑 10 册之后再出 10 册，计划收载编撰于明、清和民国的寺志等图书 14 种，从第 11 册民国姚悔盒编的《西湖寺院题韵沿革

考》到第20册清邱峻《圣恩接待寺志》等。看了新辑的编目和编委会名单,心中为之欣然,相信此书将会得到顺利编辑出版,对各地整理出版寺志、佛教图书、佛教资料及碑铭等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长年从事佛教历史研究,深知各类第一手佛教资料的重要性。中国曾是个战乱频繁、灾难深重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在文教特别是宗教领域又经历过严重挫折,各地图书文物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失。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和文教建设,重视整理古籍文献,组织编纂地方史志等等,中华民族“盛世”的气候正在展现于世。在这种大背景下来看“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的编纂出版,其意义是一目了然的。

杭州自古就是东南形胜富庶之地,古代以其治所也称为余杭、钱塘、南宋时为临安府。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临安府》引古人赞杭之佳句谓杭州“人性敏柔而惠,尚浮屠(按:佛教),厚滋味,急进取”;“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杭自郡城,西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杭州地区自六朝以来,佛教兴盛,经隋唐五代,特别在进入宋代以后,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

位。两宋时期,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就是禅宗的迅速兴盛,并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而在杭州就有很多著名的禅宗传法中心,如灵隐寺、净慈寺、中天竺寺等。南宋宁宗(1195年至1224年在位)时,朝廷取法当时的官僚等级和晋升制度,把属于政府直接控制的寺院按禅、教两类,各分为五山(五个大寺)、十刹,规定僧人晋升必须从担任小寺院住持开始,根据表现逐步提升,最后才有可能住持十刹、五山。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五记载:

余杭径山,钱塘(按:即今杭州)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门五山。钱塘中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丘,为禅门十刹。

又,钱塘上竺、下竺,温州能仁,宁波白莲等寺,为教门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普陀,绍兴湖心,苏州大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

这种制度也传到日本。日本玉村竹二校订的《扶桑五山记》(京都临川书店1983年出版)第一部分《大宋国诸寺位次》,记载了禅门五山、十刹名次和五山历

代开山住持。这应是根据日本入宋元求法僧或宋元赴日僧带到日本资料编撰的。其中所载五山、十刹与前面引文中的寺名除个别次序不同外，寺名全同，只是所用寺名是全名，五山部分还载录历代开山住持的法名。

可见，在南宋的五山、十刹中，杭州的寺院占有较大的比例，禅门五山中有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十刹中有中天竺寺；教门五山中有上天竺寺、下天竺寺，十刹中有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

在杭州的寺院中，有的在中日、中韩古代佛教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被日本或韩国佛教的某些宗派称之为祖庭。例如余杭径山上的径山寺、杭州西湖边的净慈寺，在宋元时期有不少日本禅僧来这里求法，归国后传播临济禅宗。至今，传法中心在京都东福寺的日本临济宗东福寺派将余杭径山寺当作祖庭。因为他们的教祖圆尔辩圆(1202—1280)，曾在此寺从临济宗高僧无准师范(1177—1249)嗣法而归。无准师范弟子中的兀庵普宁(1197—1276)、无学祖元(1226—1286)在南宋末应邀东渡日本传法，分别被后世奉为日本临济宗二十四派中的宗觉派、佛光派之祖。日本临济宗建长寺派的创始人兰溪道隆(1213—1278)在

赴日本前也曾到师范门下参禅。临济宗杨岐派松源下二世虚堂智愚(1185—1269)曾先后住持净慈寺、径山寺,日本禅僧南浦绍明(1235—1309)曾前来受法,回国时也将余杭径山的日常茶宴仪式和饮茶用的碗带回日本,对以后日本茶道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绍明死后,谥大应国师。绍明的弟子宗峰妙超(1282—1337)长期在京都大德寺传法,受到花园上皇的支持,赐大灯国师。绍明的再传弟子慧玄(1277—1360),号关山,长期在京都妙心寺传法,也受到花园上皇的赏识。他们三人史称“应、灯、关”,在推进临济宗在日本实现民族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妙心寺派发展成为日本临济宗中的主流派。日本妙心寺派也将净慈寺、径山寺看做是他们的祖庭。

杭州慧因寺、天竺寺与韩国佛教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天台宗虽然早在唐代已经传入韩国,然而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高丽王朝高僧义天入宋求法再次将天台宗传入韩国。义天(1055—1101),名王煦,高丽文宗的第四子,自幼承父命出家,居灵通寺,号“佑世僧统”,在北宋京都汴京(今开封)时受到朝廷很高的礼遇。义天经奏请哲宗,到钱塘慧因寺从净源法师受华严教义,又在钱塘天竺寺师事慈辩学天台宗

教义,从灵芝寺的律僧元照受学南山律学。

整理出版的“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二辑 20 册,收录了 33 种佛教寺志,必定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杭州佛教历史文化、历代高僧的事迹、著作和思想,了解杭州寺院和名胜,提供很大方便。赵一新先生告诉笔者,今后将把编校寺志和其他佛教文献的工作推广到全省。这确实是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消息。

中国自古就有盛世编藏、修典、出书的优良传统。在今天全国人民集中精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大好形势下,各地编撰新的地方志和整理出版各类古籍文献,应当说是中华民族文化日渐繁荣,中国迈入盛世的一种征兆、一种气候。笔者认为,“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二辑的相继编校出版是中国学术界、佛教界的盛举,将为杭州、浙江原有的灿烂悠久的人文财富和传统增辉。

最后,祝“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二辑编校工作圆满成功。

2007 年 11 月 25 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序

赵一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佛教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恢弘的淑世利人精神，甚为国人接纳。故尔在岁月的递嬗中，终在中国扎根，并与民生相融。因其旷日传行，日与华夏本土文明融合，在中国文化之中渗入新兴元素，对社会发展影响甚深。

杭州向称“东南佛国”，白居易谓“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盖因杭州地控吴越，文汇南北，物华天宝，民风淳厚，故与佛教的结缘甚早，标志虽为东晋慧理首建灵隐寺，但实为三国东吴时，佛法就有传入。因此，有“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一说。杭州佛教鼎盛为南宋一朝，明田汝成谓：“杭州内外及湖心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室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是时佛刹林立，梵呗相闻，高僧云集，释学昌盛，儒释交融，法传

域外，乃为全国佛教中心之一。至今杭州的菩提寺路、华藏寺巷，便是昔日迹存之佐证。而东南亚佛教人士也视参访杭州为最大夙愿。传自径山万寿禅寺的茶宴、护国仁王禅寺的“尺八”乐器等，其义已超出佛教本身。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潜心于宗教文化。倘伴湖山，目睹兴废，搜罗经墨，修葺旧遗，日有所感，月有积存，遂发起编辑是书之征。“人间兴净土，天下有同心。”从事者景从，春秋不二，文献谨成。愿念终偿，感触良深，借此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杭召开之际，谨以此书为贺。

是为序。

前 言

《天竺山志》十二卷，卷首一卷。海宁管庭芬原辑，仁和曹籀删订，住持释悟化校录。

管庭芬(1797—?)，字培兰，号芷湘，晚号芷翁。浙江海宁人。诸生。工六法，尤善画兰。除著《淳溪老屋自娱集》外，编有《花近楼》丛书和《销夏录旧》丛书两部。前者收书达91种，后者5种。《花近楼》丛书含自撰和其所辑者《溧阴志略》、《越游小录》、《同治乙丑补贲案》、《绛守居园池记句读》和《论书目唱和集》等著作五种。

曹籀，即曹金籀，字葛民，自号莲幢居士。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生于清嘉庆五年(1800)，至同治己巳(1869)尚在世，清赵之谦有题《葛民先生七十小像》，亦知其享年必逾古稀。少工辞章，三十后治经。尝言治经宜通小学，故生平于许氏之书研究最深。著有《春秋铅燧》、《古文原始》、《籀书诗集》、《籀书文集》、《籀书词集》，收在《石屋书》丛书中；《梦西湖绝句》、《释天》收在《花近楼》丛书中。晚年居西湖之石屋，其《石屋书藏记》云：“遂废远游之计，将寻西湖之石屋，奉板舆而偕隐焉。地在南山之麓，岩洞深邃，矧楼阁天成，自然之构，一

隙漏日。”

是《志》曹籀在《序》中记其缘起时说：“吾杭天竺、灵隐二山之间，统谓之武林山，为一郡之主山，不可无纪载。海昌管君芷湘，绩学士也。慨旧《志》已佚，久必失传，著为《天竺山志》。未卒业而郡城失守，稿亦全毁。迨收复后，前住僧戒恒达公拾其残丛稿本，属余踵成之。爰乃删其繁复，订其讹舛，排比而整齐之，得若干卷。”《凡例》四条，简明扼要。确定“自上天竺起，至飞来峰止，山之阳属天竺”为范围，此《志》但纪其山阳一路。于是上天竺法喜寺、中天竺法净寺、下天竺法镜寺便在其中了。除卷首宸翰外，分别为恩幸、建置、各房、山水、古迹、金石、题咏、艺文、列传、塔墓、物产、杂识共十二门。毕竟出自名家者手，全书条理井然，于各门类中，以说山，说寺，说僧，说禅，说石，说古迹，说诗文，说天竺仙境，说种种故事，构成了古杭人杰地灵的人文历史风貌。这便是此《志》的总体特色。且纂辑者在对待所征引的资料上，亦有相当见地。如卷八宋贾似道的《上天竺施田记》，并非因人废言便弃之不收，则在末尾加了按语云：“似道此文，忠孝之思，全反为自己写照。欺人乎，欺天乎，其误国要君之处，大率类是。”当然，此《志》也有不足之处，如有些门类互为交错，其间不无重复者，似当不应苛求于前人。

现据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标点。

光緒紀元嘉平月



天竺山志

仁禾轉籀署書

上天竺法喜寺
白雲堂藏板